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shi*

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 (修订版)

下册

主编 颜 敏 / 王嘉良

上海教育出版社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shi*

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 (修订版)

下册

主编 颜敏/王嘉良

副主编 邹忠民/王晓初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册 / 颜敏, 王嘉良主编·一修订本·一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444-2602-2

I. 中… II. ①颜…②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师范大学—教材②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师范大学—教材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076 号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修订版)(下册)

颜 敏 王嘉良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 插页 1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本

ISBN 978-7-5444-2602-2/I·0023 定价:33.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修订版修订人员(按音序排列)

陈 茜 程思义 黄红春 黄振林 李洪华
熊 岩 许爱珠 颜 敏 张俏静 邹忠民

第一版撰稿人员(按音序排列)

陈 琳 陈平辉 陈 茜 陈昭明 程思义
戴瑶琴 丁小卿 范家进 黄振林 景秀明
孔小彬 李宁宁 李陶冶 刘 华 罗龙炎
毛华兵 司 晨 汪雨涛 王昌忠 王雅清
肖 文 徐润润 许爱珠 颜 敏 杨剑影
杨 柳 余莉萍 张俏静 张细珍 赵江滨
钟俊昆 周绍萍 邹贤尧 邹忠民

目 录

第三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转换时期

第一章 现代文学的转向	3
第一节 文学新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4
第二节 文学新体制的确定	11
第三节 文艺批判运动	18
第四节 转换时期主流文学话语的重要理论范畴	25
第二章 转换时期的小说	34
第一节 农村小说（一）	34
第二节 农村小说（二）	44
第三节 革命历史小说	54
第四节 “干预生活”小说	68
第五节 “路线”小说与“手抄本”小说	76
第三章 转换时期的诗歌	82
第一节 政治抒情诗	82
第二节 叙事诗与“写实”诗	93
第三节 红卫兵战歌与地下诗歌	100
第四章 转换时期的散文	111
第一节 抒情散文创作	112
第二节 “三家村札记”等杂文	120
第三节 魏巍的报告文学	126

第五章 转换时期的戏剧	131
第一节 新歌剧：从《白毛女》到《江姐》	131
第二节 历史剧创作的繁荣	137
第三节 “第四种剧本”与《茶馆》	144
第四节 “革命样板戏”	151
 第四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时期	
第一章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	161
第一节 思想解放潮流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161
第二节 新启蒙下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	164
第三节 文学观念变革与文化寻根意识、现代主义思潮	167
第四节 多元形态的文学话语与写作立场	176
 第二章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	190
第一节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	190
第二节 从文化小说到寻根小说	199
第三节 先锋小说	210
第四节 新写实小说	219
第五节 新生代小说	228
第六节 王朔、王小波的小说	237
第七节 女性小说	245
第八节 长篇小说的新收获	257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的诗歌	275
第一节 朦胧诗派	275
第二节 “归来者”诗歌	283
第三节 政治抒情诗的新声	292
第四节 新生代诗群	297
 第四章 新时期以来的散文	308
第一节 反思散文	309
第二节 文化散文	314
第三节 杂文和随笔	324

第四节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	332
第五章 新时期以来的戏剧	342
第一节 新时期初期的戏剧创作	342
第二节 现实主义话剧	348
第三节 实验戏剧	356

第三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转换时期



第一章 现代文学的转向

转换时期文学在这里既是一个特指的时间概念,也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概念。所谓特指的时间概念,从现代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讲,意指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延安文艺运动到建国后的30年文学。具体地说,在其发生期产生了40年代根据地、解放区文学,在发展期产生了从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到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指中国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30年的当代文学。

很明显,这种文学历史的分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从社会历史角度讲,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都与转换时期的三个历史关键时间有关,即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观念在文学界处于支配性地位的文化语境下,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致使文学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雏形,它形成于解放区,但随着全国解放而迅速扩张并真正主宰了整个中国大陆文学界,从而导致现代文学发展的转向。

所谓有特定意义的概念,从文学性质上讲,意指上述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属于一种特殊形态的现代文学。我们认为,可以把转换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当然,转换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更注重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层面的继承,或者说它强调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现代性重于强调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性,因此形成了转换时期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形态的基本特性。

从40年代解放区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在转换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方式和同质化的文学形态。所谓一体化,意指在外在的文学体制上,它通过行政化的管理形式,建立了生产——传播——接受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方式。所谓的同质化,意指在文艺思想和文学审美形态上具有相同的性质。在文学观念上,建立了以“工农兵方向”文艺思想为理论纲领的文学主流话语,并通过文艺运动和文学批判,引导和规范文学主体,从而逐渐形成高度同质性的文学形态。这一时期文学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思想内容上以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其二,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工农兵形象为主体;其三,艺术形式上追求民族化和大众化;其四,创作方法上首先是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其次是强调“革命

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方法,在“文革”特殊时期还出现过“三突出”创作原则;其五,文学创作普遍表现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格调。如果违背这些审美特征,就被视为异端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批判,逐渐在审美特征上必然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这种文艺思想和文学审美特征表明,“五四”以来新文学所呈现的多元化的文学形态,在转换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第一节 文学新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之所以把转换时期文学的发端定在 40 年代初期的延安文艺运动,是因为指导、规范和支配整个转换时期文艺运动和文艺实践的理论纲领,主要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正是在 40 年代初期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一文艺理论体系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代表,并包括其前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关于文化和文艺问题的论述。

1949 年 7 月,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②新中国的文学史应验了周扬的确认,《讲话》不仅对解放区文化体制与文艺形态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且对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文艺思想和文艺实践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文艺理论。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理论与实践来源及现实语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③《讲话》也是应中国革命历史时期的需要而形成发展起来的。首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是毛泽东《讲话》的第一重历史背景。毛泽东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矛盾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自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

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④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为中心的社会政治革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诉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着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由于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在国家体制的有效管理下和民族国家理念之催化下”，具有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提高政治效率和加强国家凝聚力的能力，因此可以有效担负对外主权独立和对内政治统一的重要使命。^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力图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完成对外主权独立和对内政治统一的伟大历史任务。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为了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讲话》就是其中一篇。在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情境中，毛泽东作为政党的领袖，更多的是站在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立场上建构文艺理论，所以《讲话》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政治革命的需要出发阐释文艺问题。《讲话》的结论部分，专门论述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因而革命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历史，是《讲话》的第二重历史背景。“五四”知识分子认为，没有现代思想文化的民族，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巴黎和会”的失败，影响了启蒙者的初设，并再一次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故此，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以“五四”运动历史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启蒙者聚集在反传统文化的旗帜下，向社会传播现代思想文化，启蒙对象主要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市民社会群体；后一个阶段虽然启蒙者因政治思想上失去了同一性而发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政治革命运动，但是整个新文化运动因“五四”运动而迅速向全社会扩张，民族主义意识明显加强。4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状况，在长期社会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论”设想。这种理论从政治角度出发把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认为前一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属于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性质，而后一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性质。毛泽东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逻辑，有限度地肯定了具有思想文化意义的前一个阶段新文化运动，而完全肯定了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后一个阶段新文化运动，并以继承者的身份继续推动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政治文化革命。这一方面为他领导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提供政治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认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发动、组织和动员农民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动员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传播“人民

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从而将“五四”时期的民粹主义文化思潮,转换为“人民本位”的社会革命实践。

毛泽东40年代一系列论著中最突出的思想就是“人民本位”的观念。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强调,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兵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兵相结合。这种观念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革命的大众文化论。他认为“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只是限于“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革命的大众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⑥这种观念体现在《讲话》中,则形成了系统的“工农兵方向”论。

其次,任何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一个生成性的理论过程和实践基础,《讲话》的重要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是左翼文艺理论与苏区文艺实践。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论争与30年代初期左翼文艺思潮,初步形成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体系,其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左翼文艺明确宣称革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具有断代性;二是左翼文艺建构了简明的理论体系。

革命文学的断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重新理解上。“五四”文学中“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资源,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启蒙思想;这种“人”的概念建立在自然人性的基础上,以人性需求的合理性从文化上批判封建礼教的禁欲主义。而左翼文艺的思想资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思想,这种“人”的概念建立在人的社会属性上,主要强调社会解放与阶级斗争。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历史首次“人”的觉醒,那么左翼文学是现代历史中“人”的又一次建构。简明的左翼文艺理论体系的主要观点有五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明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必然性;二是批判和否定种种资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文艺观;三是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与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社会功能;四是要求革命作家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五是提倡革命文学要以工农大众为主要的表现对象。由此可见,左翼文艺运动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文艺思潮,更重要的是一场政治文化运动,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启蒙,为《讲话》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同时也源于苏区文艺实践。丁玲早在80年代初期回忆中国文艺协会1936年在陕西保安成立的情境时就说过,“随着当年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发展,苏区就有了自己的革命的文艺。这不像后来有人所说,似乎从抗日战争开始,大批知识分子、文化人进入延安之后,苏区才开始有革命文艺”。苏区文艺的特点是“工农大众文艺”,“毛主席赞扬并且支持这个方向,勉励新成立的文协要坚持这一方

向”。^⑦尽管苏区文艺形态比较粗稚,作品主要是即兴创造和改编的戏剧与民歌,但从苏区文艺与《讲话》及其指导下的延安文艺的关系来看,苏区文艺初步实现了文化体制一体化与审美形态同质化的特质。无论是部队还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艺团体,都是通过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开展文艺活动;这种一体化的体制有力地保障了文艺审美形态的同质化,即在文艺观念和审美形态上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特质:文艺观念上,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审美形态上以工农兵形象为主体,突出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关系;艺术形式上追求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品普遍地表现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调。

最后,延安整风运动是《讲话》的现实语境。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全党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的,原本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从解决对党内路线问题的认识开始,最后发展成为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错误思想的思想教育运动”。^⑧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美好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赴延安。在这批投奔革命圣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来自都市的左翼文艺家占有较大的比重。虽然根据地的环境极度艰苦,但是他们自觉服从党的需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运用各种文艺形式热情歌颂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抒发对根据地的热爱,有力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情绪和胜利信心。但是,40年代初期以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左翼文学家潜存的“五四”新文学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延安文化中重现。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和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主张运用杂文形式揭示延安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要求领导给文学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王实味更为激进,他在《政治家·艺术家》中认为,政治家“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而文学家“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所以艺术家要“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⑨他还在《野百合花》中直接批评了延安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些言论及其思想状况引起了党的领导人的高度警觉,于是整风运动从党内扩展到文艺界,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的文艺整风,也就成为整个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

针对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问题,为了规范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决定于1942年5月2日到23日邀请在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并由毛泽东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分别作了启发性的报告和总结,报告和总结经过记录整理和毛泽东

重新修改审订,就构成《讲话》文本。

总之,从外部关系讲,民族与民主革命的政治历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变异的思想历史,以及延安整风运动的文化现实,构成了《讲话》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语境;从内部关系讲,左翼文艺理论与苏区文艺实践则是《讲话》内部的理论与实践渊源。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

《讲话》由“引言”和“结论”两大部分构成。“引言”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使之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解决立场、态度和工作对象问题,解决工作和学习问题。在“结论”部分,《讲话》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确定了革命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其二,阐释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源泉与典型化问题;其三,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党的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其四,论述文艺批评的标准、“人性论”、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其五,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需要开展思想整风运动。

《讲话》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日后成为党制定解放区和共和国文艺体制和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也成为“五四”新文学传统转向的重要标识,因而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从现代文学转向的角度讲,《讲话》的重大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即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文艺必须解决“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里的群众指“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文艺为人民大众,而且“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⑪如果联系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这里所说的工农兵又主要是指农民群众,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⑫既然如此,革命文艺必须最充分地考虑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因而在如何为群众上,“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⑬很明显,革命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既瞩目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又立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

应该指出的是,工农兵文艺与“五四”新文学所提倡“平民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毛泽东认为,“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⑭因此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这种差异体现在思想

情感上就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必须是首先向工农兵学习而不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⑯而知识分子要真正解决立场和态度问题，一是必须进行世界观的改造，“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二是必须深入农村，接近农民和表现农民，成为农民的忠实代言人。^⑰

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讲话》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由启蒙者变成了受教育者和被改造者，由实行启蒙教育的“化大众”的社会角色变成了主动接受教育改造的“大众化”角色。二是“五四”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转变，是由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观念转换成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思想观念；而《讲话》的世界观的转变，是由“小资产阶级”转换成“无产阶级”的现代政治观念。三是文学形式由西方化（现代化）向本土化（民族化）转换。

第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即“革命的功利主义”。《讲话》指出：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⑱

文艺从属政治的观点，一方面是将文艺比喻为革命机器中的一部分，把文艺工作者纳入革命组织之中，从而为一体化的文艺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目的而简化其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忽视文艺自身的自足性规律，很容易导致文学艺术的政治宣传化。

必须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讲话》产生在战争环境中，有其历史缘由。在抗日战争的生死存亡之秋，革命政党必须通过自身的调整，统一组织与统一思想，充分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资源，使自身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效率。尤其在物质力量处于弱势的情境下，他们充分挖掘人的主观精神的潜能；所以信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思想政治的作用，把政治宣传工作视为有力的战斗武器和珍贵的历史传统。因此，毛泽东从政治功利的角度界定文艺，并把知识分子纳入严整的政治体制之中，应该说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讲话》与“五四”时期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化体制方面讲，“五四”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由传统社会的政治

文化中心移向边缘。大量人文知识分子在国家体制之外从事文化事业,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学校、报刊和书籍等文化中介来实现。《讲话》的体制化为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直接进入国家体制的途径,他们作为社会体制的代言人拥有社会话语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阐释者。体制化同时也使知识分子群体成为革命的螺丝钉,服从组织原则,遵守铁一般的纪律,但简单化、格式化地表现政治意志,也容易使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创作意识,较易忽视思想的自由和独立性。二是从文艺思想方面讲,“五四”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保持着独立的文化能力和话语权利。他们凭借着理性和以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社会传播文化思想,其观点没有被特定功能或利益的成见所规约。从这种意义上讲,其理性和道德的声音是比较纯粹的,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纯粹”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讲话》明确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式之一,是文艺批评”,而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其中“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⑩并以这种标准方式具体地批判了两种文艺观点。一是批判“人性论”。《讲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小资产阶级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⑪我们应该注意到,《讲话》出自革命战争年代,那是一个需要同仇敌忾和集体主义的年代,任何温情脉脉的“人性论”与自由的“个人主义”都显得与战时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二是批判“暴露文学”。《讲话》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⑫《讲话》还认为,从国民党统治区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前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者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新的时代要求作家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⑬这里把文学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上升到阶级立场的高度。

“五四”知识分子传播和宣扬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话语,表现在文艺上则是以人为本位,以人道主义为主要思想内容的批判现实主义话语。“人的觉醒”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辟人荒”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人道主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封建伦理道德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五四”文学则把人道主义作为主要的思想内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作了全面的阐述:“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⑭“个体的觉醒”同样是“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标示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可